

解析中共人民戰爭思想

顧立民

提 要

中共自1927年建軍以來，人民戰爭思想即為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主要根源於中國傳統的人民戰爭觀、馬克思與恩格斯等人的無產階級軍事思想，以及中共早年所處的現實環境等因素。歷經毛澤東的傳統人民戰爭、鄧小平的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江澤民的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到目前胡錦濤的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不同時期的領導人都相當重視此一思想，並各自給予不同的詮釋。

透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發現人民戰爭思想雖已經過近80年的時間，但其中諸如黨指揮槍、政治思想工作、軍隊紀律等原則仍為中共所堅持與運用。但受到國際環境與戰爭型態改變的影響，其人民戰爭思想也產生了若干的轉變，更加重視高科技人力的動員，以及連接資訊與網路等信息化手段，呈現出一種新風貌，以延續人民戰爭思想的生命週期。

關鍵詞：人民戰爭思想、高技術局部戰爭、黨指揮槍

壹、前 言

中共自1927年建軍以來，「人民戰爭」思想即為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分析中共人民戰爭思想的形成背景，是在武裝暴動失敗，面臨國民政府圍剿下的存亡關頭，處於敵強我弱，以奪取政權為目的之內戰型態，故必須爭取群眾支持，以增強自己與削弱敵人。在歷史成功經驗與長年政治宣教的相互影響下，「人民戰爭」思想已成為其戰

略文化的特色之一。莫大華就認為中共的戰略特質有：「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積極防禦的軍事準則」、「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黨國式的文武關係—絕對的共黨領導」、「欺敵的心理戰」等。^{註一}王世塗則認為中共戰略文化特徵是「多樣性的綜合」與「二元性的結合」，而具體表現在人民戰爭與積極防禦的軍事思想上。^{註二}中共官方則總結其軍事理論體系為「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與

註一 莫大華，〈中共戰略文化初探〉，《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第5期，1996年5月，頁47-52。

註二 王世塗，〈中共戰略文化研析〉，《國防雜誌》，第20卷第8期，1997年2月，頁5-11。

「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註三}人民戰爭思想則貫穿此三者。

中共人民戰爭思想的根源主要承襲自中國傳統的人民戰爭觀，以及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等人的無產階級軍事思想，再經由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不斷地詮釋、發展而成。配合不同時期的戰略環境、戰爭型態與現實國力等因素的變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等人對人民戰爭思想都做了不同的解釋，並對內容進行修正。時至今日，雖然中共所面臨的安全環境已經迥然不同於人民戰爭思想形成之時，但仍將其奉為圭臬。

在建政初期，解放軍的武器裝備相對落後，軍隊組織的改造與整合也未完成，其優勢在於擁有眾多的人民及廣大的領土。因此，一旦遭受敵人攻擊，中共可以運用廣大的人民及土地優勢，將敵人拉進來再打出去，以爭取所需要的時間反敗為勝。冷戰結束以後，面對新的世界局勢與戰爭型態，中共體認到必須針對以空間優勢與數量優勢為主的傳統人民戰爭思想進行改革，以適應以和平發展為主軸的國家戰略，及以高技術條件與信息化條件局部戰爭為主的戰爭型態。

本文先概要敘述中共（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根源，再分析其經歷現代條件、高技術條件與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等不同戰爭型態的發展概況，最後探討時至今日，人民戰爭思想產生了哪些變化？哪些又是不變的原則？以期為人民戰爭思想研究另闢蹊徑，提供研究者更寬廣的思考空間。

貳、中共人民戰爭思想根源

一、中國傳統的人民戰爭觀

中國在戰國時代以前，軍隊的主體是貴族（即所謂的「士」），一般平民是不當兵的；戰國時代由於傳統封建制度的逐漸崩壞，以及戰爭的大量消耗需求，各國幾乎都採取軍國主義，雖不見得人人當兵，但至少國家是鼓勵男子從軍的。^{註四}人民（尤其是農民）成為軍隊的主體，政府開始承認人民是從事作戰的主力，亦即商鞅所謂「民勇者，戰勝；民不勇，戰敗。」、「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商君書·畫策》；荀況則謂「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之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議兵》。

在中國歷史上，也不乏人民戰爭的實例：一種是由人民自主發起，以反抗統治者為目的的民變或民亂，例如秦末的陳勝、吳廣；漢朝的赤眉、綠林與黃巾；唐朝的黃巢與王仙芝；元末的張士誠、陳友諒與朱元璋；明末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國等。另一種是由民間組織義軍或鄉勇配合政府軍隊，對外禦寇或對內平亂的事例，例如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為抗金而起的諸如八字軍、紅巾軍等義軍；清朝後期為平定太平天國而起的湘軍、淮軍等。

學者總結中國歷史上的人民戰爭，認為具有下列特點：^{註五}

^{註三} 胡錦濤，〈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暨全軍英雄模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105。

^{註四}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9。

^{註五} 郭偉濤，《人民戰爭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頁28-29。

(一)都是屬於正義戰爭，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

(二)在不同程度上都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使得政府重視對於人民利益的保護，採取某些對人民有利的政策。

(三)證明一旦將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其力量是足以抗拒強敵的。

(四)創造了農民起義戰爭、民族民眾戰爭這兩種人民戰爭型態；也創造出宣傳、動員、組織、武裝人民群眾的一系列方法；也創造出官軍與義軍相互配合，軍隊與民眾相互配合的作戰模式，以及其相關的戰略戰術和作戰指導原則。

二、無產階級戰爭與軍隊觀

馬克思與恩格斯等人均以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的觀念，作為觀察戰爭的基礎，並加入階級與經濟的因素，形成共產黨特有的戰爭觀。列寧(Lenin, 1870-1924)認為「戰爭不僅是政治的繼續，而且是政治的集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戰爭是對每個民族的全部經濟力量和組織力量的全面考驗」；^{註六}他認為國家、軍隊、民眾武裝等，首先都是政治組織，其次才是暴力組織，其暴力屬性是依附和服務於一定階級或一定的政治目的。^{註七}毛澤東根據進行戰爭的社會力量的不同，將戰爭區分為階級和階

級之間的戰爭、民族和民族之間的戰爭、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戰爭、政治集團之間的戰爭等四種；而歸根究底，這四種戰爭型態都是由不同階級間的利益衝突所衍生出來的。^{註八}

概言之，共產黨人認為戰爭根源於階級，由於有不同的階級與不同的階級利益衝突存在才形成戰爭。戰爭既是因階級而起，故消滅戰爭的唯一方法便是要消滅一切的階級，也就是要消除人剝削人和一個民族剝削其他民族的現象。要實現此一目的，必須先由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但是此一過程不會自行發生，必須透過暴力革命，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人民戰爭即為暴力革命的表現型態。共產黨人「人民戰爭」思想的概念首見於恩格斯在1849年發表的論文中，他強調「一個想爭取自身獨立的民族，不應該僅限用一般的作戰方法。群眾起義、革命戰爭，到處組織游擊隊——這才是小民族制勝大民族，不夠強大的軍隊抵抗比較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隊的唯一方法」。^{註九}而根據他的分析，人民戰爭的原理包括：其一、運用人民戰爭的一方應力求使敵人的戰略進攻達到頂點（極限），將戰局態勢由敵強我弱逐漸轉換為敵弱我強；其二、依靠人民群眾的奮起抵抗，使內線（我控制區域）與外線（敵佔領區域）的戰鬥相互配合，則可加速敵人戰略進攻達到極限的過程。^{註十}

基於此一無產階級戰爭本質的認知，社

^{註六} 俞世福、韓曉林與李元奎主編，《列寧斯大林軍事思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56-59。

^{註七} 蔣順學主編，《論無產階級軍事科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97。

^{註八} 王憲志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年），頁77。

^{註九} 恩格斯，〈皮蒙特軍隊的失敗，第二篇論文〉，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軍事文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3-8。

^{註十} 恩格斯表示：「…即使一支20萬人的軍隊在佔領敵國時也不會得到許多東西。這支軍隊會迅速達到極限，越過極限它的部隊就將弱於防禦者能夠用來抵抗他們的兵力；而這種狀態將怎樣迅速到來，就全靠人民抵抗的威力了」。請參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軍事文選》，頁184。

會主義國家的軍隊自始即具有濃厚的階級色彩，馬、恩等人即認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大軍。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贏得自身解放的權利」，^{註十}列寧也曾明白指出「革命軍隊是進行軍事鬥爭和從軍事上領導人民群眾對付專制制度殘餘的軍事力量所必須的」。^{註十一}毛澤東承襲馬克思等人的理論觀念，強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來看，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註十二}無產階級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僅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需要革命暴力和無產階級軍隊，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更需要革命暴力和無產階級軍隊。

至於無產階級軍隊的組成體制，恩格斯在分析美國南北戰爭後指出，純粹的民兵是沒有戰鬥力的，必須有一批優秀的軍官做為骨幹，組織起來的民兵才能具有戰鬥力；因此「任何一種合理的軍事組織不能不是介乎普魯士制度（常備軍制度）與瑞士制度（民兵制度）」。^{註十三}毛澤東則將之發展成所謂「三種武裝力量」相結合的體制：在武裝暴動時期強調建立主力紅軍、地方赤衛隊、工農暴動隊相結合的武裝力量；抗日戰爭時期提出劃分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以及人民自衛

軍、地方軍和民兵的廣大群眾武裝組織；在國共內戰時期則實施野戰軍、地方軍與游擊隊、民兵相結合的體制。^{註十四}同時，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對軍隊領導的權威性與必要性，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註十五}

因此，共產黨人的戰爭觀具有強烈的階級性，認為戰爭是階級鬥爭與暴力的最高表現形式，只要有階級對立存在，就有可能發生戰爭。而軍隊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是國家專政的工具，因而軍隊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由於共產黨向以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居，透過形塑階級性的戰爭觀與人民軍隊，建立起黨對於戰爭與軍隊的絕對領導地位。

三、階級鬥爭觀

根據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階級的產生是由經濟因素引起的，除了早期的原始社會外，不同時期的社會存在著不同的階級，而由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存在矛盾，所以不同階級間也存有矛盾，所有的階級對立也都是由於經濟因素。^{註十六}階級產生後就必然會有階級鬥爭。恩格斯即指出：「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及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

^{註十} 馬克思，〈紀念國際成立七週年〉，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26，

^{註十一} 《列寧軍事文集》，頁40、41，轉引自王憲志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頁119。

^{註十二}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512。

^{註十三} 恩格斯，〈1868年1月16日，恩格斯致馬克思〉，轉引自蔣順學主編，《論無產階級軍事科學》，頁143。

^{註十四} 蔣順學主編，《論無產階級軍事科學》，頁144。

^{註十五} 毛澤東，〈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轉引自王憲志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頁203。

^{註十六} 丁素等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年），頁224、225。

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註六}在階級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主要是代表先進生產關係的革命階級與代表腐朽生產關係的反動階級之間的矛盾，透過革命階級反對反動階級的鬥爭，先進的生產關係才能代替腐朽的生產關係，社會才能進步。^{註七}換言之，階級鬥爭是解放生產力與改變生產關係的關鍵行為，無產階級必須透過階級鬥爭，才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取回失去的應得權利，社會才得以進步，歷史才得以向前發展。

共產黨人對於階級劃分主要採取「二分法」，像恩格斯便將工業革命後的社會簡單分為兩個彼此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註八}毛澤東則將中國社會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等五大類，其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半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朋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則是革命的敵人，至於中產階級的態度則是模稜兩可——其右翼可能為敵，而左翼則可能為友。^{註九}劃分階級是進行階級鬥爭的第一步，之後便是進行鬥爭，毛澤東的農民運動（或暴動）其實就是在農村間進行階級鬥爭，他強調在運動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階級鬥爭的過程必然會有流血暴力的情形發生，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

象，才能鎮壓農村中反革命派的活動。^{註十}

毛澤東以階級鬥爭觀做為人民戰爭思想的根源之一，並將之落實到農民運動中，主要可以分為兩種模式：在缺乏相當農民運動經驗的地方，中共黨員強調個別的經濟問題，藉此激發農民抗議，再視情況逐步升高鬥爭；但在農民運動已有相當經驗的地方，則殺盡土豪劣紳是常見的事情。中共每到一地進行農民運動，便依循「劃階級，打土豪，分田地」的程序辦事，這也導致了循環報復，農民在中共來時對地主施以殘酷鬥爭，而一旦該地被國軍收復，隨軍隊回來的地主便對農民展開同樣殘酷的報復，形成嚴重的赤白對立。^{註十一}因此，響應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農民，為了避免被報復，在中共軍隊撤走時只能選擇跟隨部隊遷移，從此成為中共忠實的跟隨者，使人民軍隊的力量在不斷的群眾運動中逐漸壯大。

四、戰爭實踐的經驗

中共的人民戰爭思想除了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外，其若干的具體指導原則主要由毛澤東依據早年（反圍剿時期）所處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環境，以及反圍剿的作戰實踐中逐步發展起來，其主要特點包括：^{註十二}

（一）建構了人民群眾與革命關係的論述，闡明了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同

^{註六}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52。

^{註七} 丁素等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頁228。

^{註八}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231、232。

^{註九}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3-9。

^{註十}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17。

^{註十一}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頁233-236。

^{註十二} 郭偉濤，《人民戰爭論》，頁98-105；廖國良、李士順與徐焰，《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頁43-44。

時發展出組織人民群眾參與革命戰爭的具體原則與方法。

(二)建立根據地的觀念與事實，以之做為人民戰爭的戰略基地，進行經濟、文化和軍事建設。

(三)確立「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改變國民政府黨與軍隊平行管理的方式，以黨為最高領導中心，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為隸屬其下的平行分工，自連隊基層向上逐級建立黨的組織，使黨的政治工作與軍隊的軍事行動與後勤工作等完全結合。

(四)逐步發展出一套進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一是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集中兵力，造敵失誤，後發制人；二是反圍剿的戰略原則，即戰略退卻，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殲敵；三是發展人民游擊戰術，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

毛澤東於抗戰之初再度強調人民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性，他提出要武裝民眾實行自衛，並配合正規軍一起作戰，將民力與軍力相結合，才能給予日軍致命的打擊。^{註五}復於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一文中，進一步說明「人民戰爭」的概念，強調在中共領

導下的八路軍與新四軍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而由此一軍隊結合地方游擊武力與人民群眾進行的抗日戰爭才是真正的人民戰爭。

^{註六}在國共內戰初期，則強調發動群眾創造戰場是當前緊急的戰略任務，^{註七}要求部隊要廣泛發動群眾，給予民眾經濟利益。^{註八}中共學者則將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總結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人民軍隊為骨幹，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人民戰爭的思想」。^{註九}

中共建政後持續面對強大敵人，包括1950年代的美國與1960年代的蘇俄，均處於敵強我弱的狀況。此時已不是以內戰為背景，削弱敵人的方式也不是爭取敵人的群眾，而是以持久的消耗戰，驅逐或殲滅進犯的敵人，憑藉廣大的土地、人口，結合正規與非正規部隊，重挫占有技術及火力優勢的敵軍之銳氣，讓寡不敵眾、深入大陸內地的來犯敵軍彈盡援絕，最後悉數殲滅。^{註十}毛澤東認為，禦敵於國門之外並非良法，必須要誘敵深入才能發揮共軍的長處，大打人民戰爭；由於敵優我劣的態勢，只有將敵人放進來，才能使其分散兵力，便於中共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註十一}文

^{註五} 毛澤東，〈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318-319。

^{註六}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頁987-990。

^{註七} 毛澤東，〈把發動群眾創造戰場當作東北當前緊急戰略任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與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132-133。

^{註八} 毛澤東，〈將創造戰場當作戰略任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134。

^{註九} 郭偉濤，〈人民戰爭論〉，頁80。

^{註十} Mark Burles &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of Doctrinal Writing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00), p.23.

^{註十一} 毛澤東在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家打來，我們不打出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對付了。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中國這個地方不小。他不得好處，我看他也不會進來。要使全世界看到我們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之中。」請參見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38；廖國良、李士順與徐焰，《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頁472。

革時期的政治失序造成工業能力與社會供應力下降，導致軍隊戰力降低，無法應付蘇俄可能的入侵，加上中共領導人普遍認為文革將會持續一段長時間，反而使中共在中美關係逐漸改善之時（1970年代初期），更加堅持毛澤東激進式的人民戰爭思想。^{註三}

參、中共人民戰爭思想的轉變

一、現代化條件下人民戰爭思想

鄧小平掌權後，由於國際局勢與威脅型態的改變，使得毛澤東時期以來的傳統人民戰爭思想產生了轉變。鄧小平一方面承襲毛的軍事思想，強調人民力量的重要性，^{註三}另一方面則將其修正為「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註四}強調軍隊建設必須由長期的戰爭環境轉入和平時期，^{註五}一則是希望在無須自動棄守重要經濟與工業中心的情況下，就能阻止蘇俄或其他潛在對手的非全面性入侵，^{註六}以避免對國家經濟發展的

嚴重破壞。二則不願再像1930到1950年代的幾場人民戰爭（作者按：指反圍剿、抗戰、國共內戰與韓戰）一般，為之付出龐大的傷亡成本。^{註七}

喬飛(Ellis Joffe)分析由於主、客觀環境的改變（包括毛澤東的死亡），共軍必須在傳統的人民戰爭思想中加入一些新的因素，使之與以往相較有所不同。諸如毛澤東誘敵深入的觀點已不適用於未來戰爭，游擊隊、民兵及游擊戰的重要性改變，必須研究新的戰法；人民戰爭主要依賴步兵，而未來戰爭依靠多兵種合成的地面部隊，作戰上將運用更多的科技武器裝備；強調軍民區分，軍隊以作戰為主；軍隊發展必須依據戰爭需要，而非政治及意識形態。^{註八}此外，1979年懲越戰爭的教訓，也促使中共在1985年對現代化戰爭的本質與威脅進行重新評估，解放軍也在1980年代開始進行提升效率與專業化的努力。^{註九}

^{註三} Thomas W. Robinson,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 The China Quarterly, No.90(Jun., 1982), pp.237-238.

^{註四} 鄧小平表示：「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請參閱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講話重點〉，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80。

^{註五} 1978年3月15日鄧小平為中共軍方軍事科學院建院二十週年題詞：「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發展我國軍事科學。」請參閱郭春鷹主編，《鄧小平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實際上，葉劍英早於1959年與1960年就已經提出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概念，他表示：「未來戰爭的性質仍然是人民戰爭，是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未來戰爭第一是人民戰爭，第二是現代戰爭。把這兩點用邏輯聯繫起來，就是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請參見葉劍英，「深入開展全軍軍事科學研究工作」、「現代戰爭與軍隊訓練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頁395、438。

^{註六} 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14。

^{註七} Mark Burles &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of Doctrinal Writing, p.41.

^{註八} Paul H. B. Godwin, "Changing Concepts of Doctrine,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978-87,"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2 (1987), p.575.

^{註九} Ellis 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A Doctrine for Modern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2 (1987), pp.559-560.

^{註十} Xiaoming 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A Re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84 (2005), p.873.

因此，針對國際與國內客觀環境、領導人的主觀認知、戰爭形式與軍事科技的變化，中共的人民戰爭軍事思想，其內涵也由傳統講求全國動員與人海戰術的數量規模型態，逐漸轉變為現代條件下重視局部動員與技術優勢的菁英規模及知識規模型態。1985年6月中共舉行軍委擴大會議，正式將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由毛澤東時期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入和平時期的現代化建設，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與軍事衝突為主（如邊界的小規模戰爭），並且應服從國家經濟大局，^{註四}但並未排除與蘇俄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仍將之納入邊界局部戰爭與軍事衝突的概念中。^{註四}

此種新的人民戰爭概念與1978年以前純粹以大量動員民眾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與財力）為基礎的傳統人民戰爭思想相較，已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傳統的人民戰爭思想是要憑藉廣大的土地、人口，讓深入大陸內地

的來犯敵軍陷入泥沼，與局部戰爭禦敵於邊境的本質相互矛盾。鄧小平認為大規模動員群眾戰鬥的傳統人民戰爭已不合時宜，基於相對和平的安全環境，必須改革軍隊體制與精簡編組，在1985年做出裁軍100萬的決策，開始「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註四}

概言之，鄧小平的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思想與毛澤東的傳統人民戰爭思想相較，大致有下列改變：

（一）仍然堅持黨對軍隊的統一指揮與領導，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註四}

（二）改變以往以陸戰為主，海、空軍力量有限配合的作戰形式，強化海、陸、空、天合成兵力的建設，以因應現代科技戰爭需求。^{註四}

（三）多次強調軍隊要消「腫」，^{註五}要以質量代替數量，並且提出加強幹部教育，培養「紅」、「專」人才，^{註六}建設一支具有良好

^{註四} 鄧小平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上改變毛澤東時期對於戰爭危險迫近的看法，認為在較長時間內部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並且表示軍隊建設要轉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應服從國家經濟大局。請參見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26-129；Paul H. B. Godwin,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Revised: Local and Limited Wa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19 (1992), p.193.

^{註五} Ibid., p.195.

^{註六} 曜祈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發展》（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頁152。

^{註七}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70-371。

^{註八} 鄧小平曾表示：「現在是合成軍隊作戰，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裡也有，不是過去的小米加步槍了。」請參見鄧小平，〈軍隊整頓的任務〉，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1。

^{註九} 鄧小平先後曾於1975年1月解放軍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同年七月中央軍委會擴大會議、1977年12月中央軍委會全體會議以及1980年3月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軍隊必須消「腫」的談話，請參見鄧小平，〈軍隊要整頓〉、〈軍隊整頓的任務〉、〈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精簡軍隊，提高戰鬥力〉，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1-3, 15-24, 69-81, 248-254。

^{註十} 所謂「紅」就是政治合格，鄧小平曾指出：「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認識到人民自己的利益並為之奮鬥的有堅定信念的人。對我們軍隊來說，有堅定的信念現在仍然是一個建軍的原則，仍然不能丟掉，這是中國自己的特點。」而所謂「專」就是軍事過硬，即如鄧小平所說：「現在打仗，我們的軍官沒有現代化戰爭的知識不行。…要有知識，天上、地下、陸上、水下，包括通信聯絡都要懂得。」請參見鄧小平，〈精簡軍隊，提高戰鬥力〉，頁253；〈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90。

思想與作風，以及現代化戰爭軍事知識和指揮、管理能力的幹部隊伍。

(四)要求從國家大局，尤其是經濟大局出發，作為進行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客觀基礎。^{註四}

(五)將毛澤東時期「三結合」（即野戰軍、地方軍與民兵）的軍隊組織體制，改變為解放軍、人民武警與民兵預備役組成的新「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建設精幹的常備軍與強大的後備力量。

(六)民兵的重要性降低，從共同作戰的角色淡出，成為解放軍的後備軍，為其提供人力。^{註四}

(七)由於現代科技影響，使戰爭呈現初戰即決戰的趨勢，毛澤東的三階段論（戰略退卻、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以及傳統全國與全民動員概念不再適用，要求軍隊必須具有遂行快速及致命反應的能力。^{註四}

(八)其戰略設想前提仍是預防敵人大舉入侵，但從以往的「誘敵深入」轉變為「禦敵於國境」，持久戰轉為追求速勝，將重點置

於防衛大城市及重要工業中心。^{註五}

二、高技術（信息化）條件下人民戰爭思想

1991年的波灣戰爭促使中共開展對高技術戰爭的研究。江澤民在解放軍內部的討論會議中指出波灣戰爭是「一場比較典型的高技術戰爭」，它讓解放軍知道本身在武器裝備與高技術方面與西方國家的差距正在逐漸拉大，必須要全面分析多國聯軍的電子技術、海空軍戰略武器、戰爭的性質與戰略決策、戰略指導對戰局的影響。^{註五}根據新戰爭型態的變化，江澤民分於1993年及1995年兩次對軍事戰略與軍隊建設指導方針的轉變作出指示（統稱為「兩個根本性轉變」），確立解放軍軍事指導準則的轉變。^{註五}

隨著2003年伊拉克戰爭揭開現代信息化戰爭的序幕，中共在2004年12月公布的《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指出：「人民解放軍立足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按照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目標，深化改革，銳意創新，加強質量建設，積極推進以信息化為核心的中國特

^{註四} 鄧小平於1984年中央軍委座談會中提出：「現在需要的是全國黨政軍民一心一意地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我們軍隊有自己的責任，不能妨礙這個大局，要緊密地配合這個大局，而且要在這個大局下面行動。…總之，大家都要從大局出發，照顧大局千方百計使我們國家經濟發展起來。發展起來就好辦了。」請參見鄧小平，〈軍隊要服從整個國家建設大局〉，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99。

^{註四} Ellis 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A Doctrine for Modern War," p.567.

^{註四} Paul H. B. Godwin,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Revised: Local and Limited War," p.195.

^{註五} Paul A. Torelli, Implications of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 on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9), p. III ~5.

^{註五} 江澤民，〈關於軍事戰略方針和國防科技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江澤民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42-147。

^{註五} 1993年初，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中央軍委，根據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變化，以及對於波灣戰爭的經驗總結，將其新時期的軍事戰略方針，從應付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轉為準備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又於1995年12月的軍委擴大會議，通過〈九五期間軍隊建設計畫綱要〉，提出在軍隊建設上要逐步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請參見潘日軒主編，《戰略轉變的歷史和歷史性戰略轉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4-175。

色軍事變革。」，但仍強調要「堅持人民戰爭思想，發展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註五}象徵雖然中共的軍事指導原則，由1990年代的「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開始向「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階段轉變，但人民戰爭思想仍然是構成其軍事戰略的原則之一。

雖然江澤民指出諸如「堅持戰略上後發制人」、「堅持人民戰爭」、「立足現有裝備戰勝敵人」、「立足複雜困難情況下作戰」等傳統戰略指導思想與原則，仍然適用於高技術局部戰爭。^{註六}不過，在實際作戰指導方面，張震則指出應該重新檢討傳統的「陣地戰」、「游擊戰」與「運動戰」的作戰指導方式，承認在現代高技術戰爭中，陣地戰與游擊戰將僅能發揮輔助與配合的作用，主要要靠運動戰，而對於承襲自蘇軍的「集中兵力，重點突破」陣地進攻方式，也要思考其適用性與改變方向。^{註七}托瑞里(Paul A. Torelli)則認為中共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事準則，已經從以往預防敵人大規模入侵轉變為預防區域危機與邊界衝突，採取有限的戰略目標（獲取外交利益及懲罰敵人），認知到未來的戰場空間及作戰時間均為有限，必須追求快速部署優勢軍力以獲得勝

利。^{註八}

對於信息化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轉變，可以區分為對戰爭本質、武器效用與作戰型式等三點來觀察：

首先，在對於戰爭本質的認識上，共軍認為現代戰爭中的正義性仍對於戰爭勝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註九}故人民戰爭的「義戰」觀與正義戰爭特性，仍符合信息化戰爭的本質需求。而基於共產黨人對於戰爭與政治關係的理解，渠等認為信息化戰爭並未消除戰爭原本的政治屬性，它仍然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最高鬥爭形式，仍然是流血的政治」，而信息化戰爭主體雖然擴展到軍事、政治、經濟與科技等領域，但並未否定戰爭是為某一階級或國家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本質。^{註十}因此，人民戰爭制勝的根本點即在於將政治上的優勢轉化為軍事上的優勢，「以對敵鬥爭的總體力量優勢獲取戰爭制權」，贏得最終勝利。^{註十一}

其次，在對於武器效用的認識，強調必須要以辯證觀點來看信息化武器裝備在戰爭中的作用，既要發展自己的「殺手鐮」武器，也要立足現有裝備，研究在非對稱作戰中克敵致勝的方法，避免落入「唯武器論」的思想泥淖。^{註十二}同時，使用武器裝備的是

^{註五}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年中國的國防〉，《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註六} 江澤民，〈國際形勢和軍事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江澤民文選，第一卷》，頁287-288。

^{註七} 張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一步加強軍事科學研究〉，中國人民解放軍張震軍事文選編輯組，《張震軍事文選，下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頁537。

^{註八} Paul A. Torelli, Implications of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 on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 III ~5.

^{註九} 鄧鋒，《轉型中的軍事理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06。

^{註十} 嚴高鴻、杜永吉，〈毛澤東的戰爭觀與當代戰爭〉，《中國軍事科學》，第17卷第1期，2004年第1期，頁28。

^{註十一} 周海航、邱桂金與彭光謙，〈人民戰爭制權理論初探〉，《中國軍事科學》，第16卷第2期，2003年第2期，頁8。

^{註十二}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大力弘揚人民軍隊敢打必勝的戰鬥精神〉，《中國軍事科學》，第18卷第4期，2005年第4期，頁73。

「人」，故高技術武器裝備並未改變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主體地位，它仍是所有戰爭資源的創造者。^{註六}而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成為戰鬥力的基本型態，人的科技素質在戰鬥力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註七}高技術武器裝備必須配合高技術人才群體，才能充分發揮其效用。

再次，對於作戰型式的認識，表示現代戰爭將形成一個陸、海、空、天（太空）、信息等多維與多層次結合的戰場體系，要發展包括機動戰、信息戰、火力戰、導彈戰、結構破壞戰、網絡戰、斬首戰、特種戰等多種進行人民戰爭的作戰形式。^{註八}此外，必須認清本身在武器裝備發展上的弱點，將毛澤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戰略戰術原則，運用於信息化條件下以弱敵強的非對稱戰爭，其核心在於揚長避短，在自己有利的時間、地點與條件下，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與敵作戰。^{註九}凡此，均顯示在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影響下，中共傳統的「人民戰爭」軍事思想，其內涵已由以往講求全國動員與人民海戰術的數量規模型態，轉變為重視局部動員與技術優勢的菁英規模與知識規模型態。

肆、對人民戰爭思想延續的爭辯

一、中共內部觀點

中共內部對於傳統人民戰爭思想的價值是傾向正面觀點，這當然有其歷史傳統、實踐經驗與意識型態繼承的因素在內，並非純然是從實踐觀點出發。^{註十}徐向前在1970年代末期即曾表示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源於戰爭的實踐，並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所以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是脫離實際的僵化教條；強調在推動國防現代化的同時，要「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戰爭的新情況，解決現代戰爭可能出現的新問題。」^{註十一}突出人民戰爭思想不是僵化死板的教條，是一套能夠「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靈活理則。

雖然波灣戰爭使中共的軍事戰略由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向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但江澤民在軍方關於波灣戰爭的座談會上表示不能忽略本身的優勢在於「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萬一打起來，我們既有正規軍，又有民兵，誰進來就把誰置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註十二}並於1993年強調中共必須發展「一套適應現代條件下作戰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以彌補武器裝備的劣勢，即使到未來軍事技術與武器裝備水準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縮小了，「我們仍然要

^{註六} 周海航、邱桂金與彭光謙，〈人民戰爭制權理論初探〉，頁8。

^{註七} 馬德寶、孫光偉，〈學習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最新成果〉，《中國軍事科學》，第1期，2008年，頁8。

^{註八} 鄧鋒，《轉型中的軍事理論》，頁209。

^{註九} 徐根初，《跨越——從機械化戰爭走向信息化戰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69。

^{註十} 例如張萬年即表示：「人民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革命戰爭實踐的產物，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根本原理和黨的群眾路線在戰爭中的體現。堅持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堅持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請參見，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87。

^{註十一} 徐向前，〈為實現國防現代化而努力奮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第二編研室編，《徐向前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頁280。

^{註十二} 江澤民，〈關於軍事戰略方針和國防科技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江澤民文選，第一卷》，頁143。

堅持人民戰爭」；預判未來一旦發生戰爭，敵人將以精確制導武器與遠程作戰飛機進行空襲，再加上獨立實施的海、空戰，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要堅持實行人民戰爭，不能有絲毫的動搖」。^{註六}

《解放軍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從戰爭實踐中證明，武器雖是戰爭的重要因素，對戰爭進程有重大影響，但戰爭勝負決定關鍵因素是人；強調固然應重視發展高技術，以改善本身的武器裝備，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和戰略戰術基本原則仍是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制勝的法寶。人是戰爭的主體，武器是由人創造和支配的工具，把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良好結合，才能形成戰鬥力。武器裝備的改善對人的因素，亦即人的政治思想素質與科學文化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人民戰爭正是其特有的政治優勢。^{註七}概言之，中共認為以其目前的整體國力與軍事實力與「強敵」相較仍居於劣勢，人民戰爭思想中「以劣勝優」的戰爭原則仍然適用；未來可能面臨的戰爭模式是反侵略、反分裂的局部戰爭，其目的在維護和平、維護國家統一與內部安定，具有正義戰爭的屬性，仍與人民戰爭的本質相符。^{註八}因此，人民戰爭思想完全符合中共的客觀環境與實際需求，仍然可以適用於目前與未來的戰爭中。

不過，中共對於傳統人民戰爭思想也非一味地因襲而不加變通。張萬年等人分析軍

事變革與戰爭型態的轉變對傳統人民戰爭造成下列嚴峻的挑戰：^{註九}

(一)戰爭型態轉變為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以往「舉國迎敵、全民參戰」的戰爭形勢將轉變為「局部地區動員和全國部分行業動員」。

(二)作戰力量上強調技術密集的精兵對抗，對以往依靠人力數量優勢方式（即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作戰方式造成挑戰。

(三)高技術局部戰爭的直接作戰空間範圍縮小，不利於以往利用廣大國土分散耗敵的作戰方式。

(四)高技術局部戰爭在作戰時間上呈現節奏緊密的速戰速決特質，傳統以戰略持久扭轉戰局的作戰方式已難以奏效。

(五)以劣勢裝備與優勢裝備之敵作戰，雙方在技術上的大幅差距，將使其傳統作戰優勢所在的近戰、夜戰，無從發揮效用。

遲浩田也提出類似的論述，他於1998年1月以〈現代高技術條件下的人民戰爭問題〉為題對國防大學學員做專題授課時表示，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強調技術密集的精兵對抗，相關戰場空間擴大而主戰場縮小，要求速戰速決，以信息化、智能化、一體化的諸軍兵種聯合作戰為主要作戰型式；相形之下，依靠人力密集的數量優勢、廣大國土分散消耗敵人、戰略上持久作戰轉換戰局，以及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等作戰型式的傳

^{註六} 江澤民，〈國際形勢和軍事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江澤民文選，第一卷》，頁287、289。

^{註七} 姜思毅，〈認真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解放軍報》，1991年7月3日，版3。

^{註八} 尚金鎖、吳子欣與陳立旭編，《毛澤東軍事思想與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頁230-232。

^{註九} 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頁189-191；張萬年，〈人民戰爭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中國人民解放軍張萬年軍事文選編輯組，《張萬年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頁724；張震，〈正確認識高技術的發展，探討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中國人民解放軍張震軍事文選編輯組，《張震軍事文選，下卷》，頁529。

統人民戰爭作戰方式面臨嚴重挑戰。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改革開放使中共在高科技領域多有成長與突破，高科技人才日益增加，為人民戰爭潛力提供新的增長點；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動員人民群眾參與戰爭提供新有效手段；現代高科技作戰系統對整體與後方的高度依賴性，為廣泛開展人民戰爭提供新的思路和對策。所以，應該「創造性地發展現代高技術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則，建設「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常備軍與一支「數量充足、質量較高、動員快速、機制完善」的後備力量，並適應高科技時代需求，建立完善的國防快速動員機制，「努力豐富和發展人民戰爭理論及其戰略戰術」。^{註三}

共軍認為信息化戰爭不僅沒有降低「人的主觀能動性」，反而對其發揮提供更佳的條件與更高的要求，而信息作戰在客觀上要求「軍民一體化」，使作戰呈現一定程度的「平民化」。^{註三}由於信息化技術與系統具有高度的軍民通用性，共軍方提出「網路人民戰爭」的觀點，認為網路空間打破傳統國界範圍，其「虛實結合」的特性，為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應用提供絕佳的舞臺。^{註四}任何一個懂得電腦的人都可能成為「網路戰士」，可以從不同的地方與領域對敵人實施

網上進攻，使信息作戰的戰爭潛能主要蘊藏於整個社會中，信息時代使人民戰爭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而中共信息化的快速發展，不僅為軍隊信息化建設提供先進技術與經驗，也為未來實行信息化人民戰爭奠定厚實的物質基礎。^{註五}此外，在信息化戰爭中，人民群眾支持與參加戰爭的型式將更加多樣化。^{註六}

綜合上述中共對於人民戰爭思想價值的觀點分析，可以得知中共是從軍事思想的精神與原理、原則，而非落伍過時的動員與作戰方式來探討人民戰爭思想的存在價值與發展空間。因此，在中共的觀點中，信息時代的軍事變革與戰爭型態變化，非但沒有使人民戰爭思想成為歷史陳跡，反而賦予其更多的發展動力與空間。然而，由於中共在科技與信息化的發展程度上，與西方先進國家相較仍存有差距，是否有足夠能力與能量實踐其人民戰爭思想在信息時代的轉型，仍須持保留態度。

二、西方學者觀點

相對於中共正面積極的觀點，西方學者則對人民戰爭思想的存續發展抱持較為保守，甚或是負面的觀點。學者雖然同意解放軍的戰略已經轉向以現代戰爭為目標，但不代表不再參考毛澤東的戰爭原則，毛的軍事

^{註三} 景抒展、黃華敏，〈現代高技術條件下仍然要堅持人民戰爭〉，《解放軍報》，1998年1月9日，版1。

^{註三} 越昌軍、李勁松，《信息化戰爭作戰理論創新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135、137。

^{註四} 朱小寧、王東林，〈網絡：人民戰爭新空間〉，《解放軍報》，2003年3月4日，版6。

^{註五} 石啓明、黃玉亮，〈堅持人民戰爭基礎上的信息化戰爭〉，《解放軍報》，2003年4月15日，版6。

^{註六} 例如使用地方電信、太空、航空、人防、公安等通信網路與設備，與參戰部隊的相關技術裝備結合，建立適合戰役需求的全方位的指揮與控制系統，確保軍隊信息管道暢通；組織相關人員，藉助網際網路的開放擴散作用，進行戰爭動員和政治、軍事、外交宣傳；利用地方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對敵展開心理戰，動搖其決策，瓦解其民心士氣；組織地方技術支前力量，對一些民用設施和器材進行信息技術改造，使其具備相應軍事目標的信息技術特徵，欺騙與迷惑敵人。請參閱程遠超，〈簡析信息作戰的民眾性〉，《解放軍報》，2004年9月21日，版6。

思想仍然是其軍事準則的重要來源。不過，堅持人民戰爭思想對其具有某種程度的不利影響：例如人民戰爭的基本概念包括面對強敵作戰、誘敵深入、持久戰與三階段戰略論（即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其中有兩項要素仍然對共軍的現代化造成影響，包括認為對地區群眾的政治工作與戰鬥同樣重要，以及願意決定將缺乏訓練的部隊投入作戰（如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之時），後者與準則轉變中要求建立一支良好訓練的專業部隊的原則相違背，象徵解放軍在戰略文化轉變上的困難。^{註七}

喬飛則認為共軍仍不放棄毛的人民戰爭思想是基於政治與意識型態考量，雖然表面上仍不斷宣傳人民戰爭思想在現代戰爭中的實用性，但實際上對其已不再發展而將之放棄了，其所持理由為：^{註八}

（一）軍事準則為指導戰爭進行與軍隊運用的原則，而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是因應敵人入侵中共內部，動員人民抗敵的情況，而後毛時期的軍事衝突情況則完全不同；

（二）軍事準則也決定因應何種可能作戰狀況下，組織架構、武器獲得政策，以及軍隊建設的方向。毛的人民戰爭思想植基於「人」重於「武器」的假設，人的質量可以彌補武器質量的不足，後毛時代的解放軍卻已摒棄此種假設，致力追求現代化及專業主義。

對於中共何以時至今日仍不明白宣示放棄人民戰爭思想，其實與前述源自馬克思與列寧的階級軍隊觀有密切的關連。喬飛分析指出人民戰爭思想所定義的人民軍隊是由工農階級所構成，解放軍中有一些人害怕一味強調現代化與專業化，會使軍隊被中產階級所控制，失去人民軍隊的特質，並與社會產生疏離；軍隊現代化也會使毛將軍隊視為一所革命的大學校的軍隊建設原則，被當作是過時的產物，對意識形態造成衝擊，影響軍隊的紀律。^{註九}所以，堅持人民戰爭思想不僅象徵對於共產主義「人民軍隊」與「無產階級軍隊」特質的繼承，更是對於由此引伸出來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的確保，同時具有維護意識形態與實際利益的雙重作用。

不過，也有學者對人民戰爭思想的實用價值抱持正面看法。例如提福特(Earl H. Tilford)回顧歷史發展，就認為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遭到的軍事失敗（如韓戰、越戰，而法國的越戰及蘇俄的阿富汗戰爭也是類似的實例），其對手通常不具備強大的海、空軍力量，陸軍也包含大量的輕型步兵，他們使用非傳統的戰略、戰術，並具備承受重大傷亡的戰鬥意志，最終取得勝利。因此，在研究中共的軍事戰略上，仍須重視辯證法的作用，毛澤東的戰法（人民戰爭）

^{註七} Paul A. Torelli, Implications of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 on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 III ~4.; Paul H. B. Godwin, "Changing Concepts of Doctrine,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978-87,"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2 (1987), p.589.

^{註八} Ellis 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A Doctrine for Modern War," p.571.

^{註九} Francis J. Romanc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Armed Forces," Asian Survey, Vol.20, No.3 (1980), p.302.此外，國內學者丁樹範也指出「以共產黨的理論而言，國家機構受黨的領導，而黨為所有的政治力量的整合中心，由分散在黨、政、軍各領域的黨員菁英所組成。因此，軍隊絕對服從效忠的對象仍為黨。否則，軍隊將因此喪失效忠認同對象而陷於四分五裂狀態。」請參見，丁樹範，《中共軍事思想的發展1978-1991》（臺北：唐山出版社，1996年），頁110-111。

即使在信息時代的軍隊與作戰中，仍有其功效存在。美軍不可過度自滿而造成文化短視，不要忽視對手力量的提升。此外，即使在信息時代仍有可能出現消耗戰，美國仍須準備打第一波與第二波的戰爭；如果競爭者在網路空間支配方面獲得立即的發展，則美國甚至應將投降列為可行的解決方案，而如果對手可以忍耐犧牲，進行有效的低階攻擊，仍有取勝的可能。^{註△}

因此，西方學者的觀點指出了中共不放棄人民戰爭思想的關鍵原因，即為維持與延續特定的意識形態，以及由此延伸而來的戰爭與軍隊特質。如中共在1997年12月「十五大」的施政報告中，將「重視科技強軍，加強質量建設，以適應世界軍事領域變化」與「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強化黨軍關係」同時列為跨世紀軍隊建設兩大主軸。^{註△}此即意味著強調專業性的高技術戰爭與強調意識形態的人民戰爭間的妥協。

伍、結 論

中共以暴力革命起家，在其軍事武力發展過程中，長時間處於敵強我弱的狀態。在正規的軍事武力（即軍隊）與經濟力量（即後勤）均不如人的情況下，必須另闢蹊徑，結合非正規的軍事武力（即武裝游擊隊）與經濟力量（即民間給養），以求克敵致勝。毛澤東一再強調：「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

是物。」^{註△}故人民群眾不僅是進行戰爭的人力資源，直接參與及配合軍隊作戰的主力，更是戰爭物資的生產者與供應者，而其人民戰爭思想便是在此一背景環境下，圍繞人民此一主體逐步發展而成。

透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理解，人民戰爭思想對於中共的重要性絕不僅限於軍事層面，還有更深層的政治意涵。因為無產階級的軍事思想本就帶有濃厚的階級意識與政治色彩，故人民戰爭思想也同時具有政治性、群眾性與軍事性等特質。中共從建黨、建軍到建政的實踐過程中，深切體認到黨、軍隊與人民三者結合的重要性，透過其中諸如黨指揮槍、政治工作、軍隊紀律、群眾動員等要素，落實黨指揮槍與人民軍隊等基本原則，有機地將黨、軍隊、人民三者結合為一體。由此進一步建構了「政黨」、「國家」、「軍隊」三位一體的制度文化模式，「否定軍隊屬於黨，就會否定黨的執政地位，就會改變黨所創建的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否定軍隊屬於國家，就不符合黨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也否定了軍隊在國家體制中的重要作用。」^{註△}前軍事科學院政委溫宗仁上將即表示在「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建設信息化軍隊」方面，仍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此一問題上「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和動搖」，否則軍隊建設將失去前進的「根本動力」。^{註△}胡錦濤將共軍的優良革命傳統總結為「聽黨指揮、服務人民、

^{註△} Earl H. Tilford,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Prospects and Cautions*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1995), pp.13-16.

^{註△}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中共年報1998》（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8年），頁16-17。

^{註△} 毛澤東，〈論持久戰〉，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437。

^{註△} 王真，〈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文化解讀〉，《中國軍事科學》，第19卷第2期，2006年第2期，頁79。

^{註△} 溫宗仁，〈繼承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中國軍事科學》，第16卷第6期，2003年6月，頁10。

英勇善戰」，其中「聽黨指揮，是黨和人民對人民軍隊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軍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註金}

中共官方曾將毛澤東思想總結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與「獨立自主」三個基本要點，^{註金}這些要點大致均可於其人民戰爭思想的發展歷程與內容中窺見蹤跡，故將人民戰爭思想視為毛澤東思想在軍事領域的具體表現並不為過。人民戰爭思想既然是毛澤東思想在軍事領域的重要產物，只要毛澤東思想繼續作為中共建黨立國的指導思想，人民戰爭思想便必須與之共存。故對於人民戰爭此一賴以起家的軍事思想，無論環境與戰爭型態如何轉換，都必須努力地讓其「與時俱進」，即便是實質內容已經被修改的幾已無復原形，仍然必須繼續堅持披上「人民戰爭」的外衣，以免引發軍隊內部對路線改變的疑慮，動搖黨控制軍隊的思想基礎，甚至觸碰是否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敏感爭議。

不過，中共的人民戰爭思想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也有其不變與變的部分。諸如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軍隊的紀律問題、後發制人的積極防禦戰略、以劣勝優的作戰傳統與原則，及以人為戰爭主體的軍事原則等原理原則，迄今仍為中共所堅持與實踐。另一方面，隨著時勢推移，中共的人民戰爭思想也做了若干重要的轉變，諸如在人力動員上轉變為間接動員與高科技人才動員，類似於西方國家「全民國防」的概念；在戰略戰術上則強調發展

網路戰、金融戰、貿易戰、媒體戰、心理戰等新作戰模式。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共人民戰爭思想時，不可將其視為過時落伍的軍事思想，而應與時俱進的不斷觀察其新的時代意涵，才不至於失之偏頗。

收件：98年06月15日

修正：98年06月23日

接受：98年07月02日

作者簡介

顧立民，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現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共軍事、中共政治、中共經濟、兩岸關係。

^{註金} 胡錦濤，〈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暨全軍英雄模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頁1104。

^{註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832-836。